

## ■ 聚焦 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浮城》 用文学为故乡作传

□汪 政

没到过江苏兴化、泰州,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这里的写作者和文化人的影响。刘仁前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他们看着他成为了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刘仁前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他能切实感受到读者的依赖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力量和写作的意义,在故乡,他如鱼得水。刘仁前以及他的同道们令人惊讶地显示了里下河地区旺盛的文学生命力。

文学对普通民众、对乡土和地方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对大众来说,文学是别人的事。文学活动、文学研究,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事都变得“势利”了,少有人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少有人关心一个地方、一个社区还有没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这些地方和社区中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轻视、忽视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如今,我们开始逐渐重视“艺术民主”,重视民众在文化中的“自我表现”,我们能否从文化民生的角度讨论一下文学的位置,将重心下移呢?

应向刘仁前们致敬,向这些坚持在地方、书写地方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是地方的文心和文脉。

今年年初,刘仁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香河》《浮城》,《香河》是第二版。这两部作品都是写他的家乡里下河的。在我看来,两部作品是一个系列,有着内在的联系,《香河》的故事时间是在“文革”,但刘仁前不是写“文革”,而是写里下河的文化,写里下河的风土人情。因此,作品是散文化的,除了柳家的故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完整的戏剧性的故事单元。刘仁前实际上是以里下河地区的节气和农事为叙事线索的,一方面是里下河地区富有特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亦农亦渔,一方面是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婚嫁喜丧。自然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记忆里那个年代如大事记一般的重大事变,但也就仅此而已,外面的政治风云似乎未曾对这个从地貌上看似“锅底”的小乡村产生想象中的影响,人们一方面以普通话重复着上面的口号,一方面依然以方言安排着自己亘古不变的生活。

这种两张皮的结构很有意思,也是刘仁前对中国乡村生存方式的直观写照,至少,这是中国乡村在近年城镇化之前顽强的生命力和它对中国社会传承与稳定的独特贡献。这其实就是社会学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在最初的意见上,“大

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在中国乡村,来自城市的政治与权力并不如初起的那么强大,它们被乡村的宗族力量、乡规民俗和民间宗教等“小传统”消解和重新表达。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而言,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刘仁前用他的“香河村”叙事完整地呈现了在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着的“乡土中国”,也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华东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

《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刘仁前的观点上移了——《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子,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子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的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到了《浮城》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所以,有出版商曾建议将作品按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来出版。这显然是对作品的有意误读。《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的无缝对接不是偶然的,刘仁前显然试图给我们一个自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所以,《浮城》并不是官场小说,它的着眼点并非政治学的,而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如果从官场小说的角度讲,现在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什么看点,因为现行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与为官僚策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生活记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刘仁前的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

在与泰州朋友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对扬州、泰州这个江苏腹地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市县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浮城》中写到的兴化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和起伏命运以及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任何地方,它们都是话题。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这样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观政治史”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其实,这也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另一种解构和重塑。这样的叙述还是,这是一种策略,官员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农村与乡镇的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人们通过这样的叙述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往空间,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也会自然而然地融

摇晃的身躯出奇地迅捷而轻盈地奔过去,“一下抓起泥灶上正沸腾着的开水壶,双手把水壶高高举过头顶,张翠芬只说了一句,你还是不还这债?两手忽然一斜,整壶滚烫的开水冒着雪白的蒸汽向她的头上脸上奔去,像一道雪白的瀑布,她就像是站在一幅画中,正沐浴在陶罐中流出来的泉水中……”这个苍老无助却坚韧无比的女人用自戕完成了对恶劣强者的最致命的一击。

擅长并钟情于表现女性当下生存状态的孙频,其写作隐约透着张爱玲似的苍凉风格。《月煞》再次为读者讲述了女性卑微无助、苍凉幽暗的悲剧人生。小说构思独特,叙事节制有张力,而文字的魔力也是一种内在的推动,那种“兀自燃烧”的句子足以吸引并打动读者,也足见孙频出色的语言修辞能力。小说从头到尾都被月光所笼罩——“月光像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她身上”,“她忽然被钉在青色的月光里”,“寂静的月光像蛇一样缠着她的喉咙”,“街上满是月光,无孔不入的月光”,“月光像洪水一样洁净地冲洗着整个小镇,所有的角落里弥漫的都是这种月光的冷腥,像一场盛大的灾难即将燃烧”。作者借“凌历天枢”的月光营造出一种肃杀鬼魅之气。月煞的意象增添了悲剧色彩,也暗喻了人物悲凉、苦难、无助、愤怒的情绪,读来令人震撼。

当我们迎面撞见那片凌历尖锐的月光,当我们跟随祖孙俩的脚步走进他们的命运,当我们为祖孙三代人的命运感叹时,当一直沉默的羔羊终于愤怒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在镇口,站着一堆黑压压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等着她坐的车走过来,他们都知道,她是今天走……”邻里们都齐齐地无声地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们,她看到了人群中的李战海,还有来宽,他们也看到了她。他们默默地躲在人群后面,目送她走过去。”是的,刘水莲带着全镇人凑的学费,在全镇人默默无声的目送中离开了小镇。

孙频说过,她的写作是为了补偿“所有的缺失与渴望,所有不为人知的爱与悲伤,补偿生命中的种种苦难”。这个悲剧故事的结尾依然传递了一种温暖的人性,令读者不禁在掩卷之余默默地为刘水莲祈祷祝福。

## 《古代将帅演义》展示军事文化

**本报讯** 5月10日,河南南阳作家李荣泰的《古代将帅演义》首发式在北京举行。该书是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共120回320万字,以历史演进为经线,以人物事迹为纬线,在叙述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等过程中,刻画了500位历代将帅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英勇顽强、刚毅睿智的性格,集中呈现了中国古代将帅的思想、武功、谋略和伟绩。与会军事专家和文化学者将其称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军事文化作品,一部讴歌华夏名帅猛将的交响曲。作家二月河认为,冷兵器时代

的“将帅”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精神遗产。作者将中华五千年军事、战争、战场融为一体,以小说的形式为这些将帅立传,做了一件可贵的事。作家周大新说,该书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故事讲得扣人心弦。书中浸透着民族魂、精气神,令人回味无穷。评论家丁夏认为,作者以强烈的爱国情愫、充分的生活积累、扎实的创作态度成就了这部书,系统展示了我国古代将帅兵法的演变史、发展史,兼具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和传奇性。(籍云)

## 第8届台湾薛林诗奖颁奖

**本报讯** 5月10日,第8届台湾薛林杯诗学青年诗奖颁奖式在西南大学中国台湾研究所举行,女诗人白月的诗集《白色》和打工诗人何真宗的诗集《温暖的城市》获奖,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为他们颁奖。据评委会主任吕进介绍,薛林先生是台湾知名诗人,原籍重庆万州,1995

入其间。也因为《浮城》中类似的个人体验和个人情怀,我曾经想从青春记忆与个体成长仪式上来讨论它。作品中的许多故事和场景作为原型刘仁前都是亲历者,而那段岁月对作者来说是他成长和改变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不可能释怀,迟早要以文字来纪念它。但是,由于文本的“客观性”,我还是放弃了这一角度,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县级政治的许多故事,看到在当年乡村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情形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它不可能单纯地在政治层面运作,必然牵涉到乡村隐藏的权力、宗族、人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官员,你被赋予了多种身份与角色。小说开始于柳成荫从邻县调回自己的家乡任县委书记,这里是他的故乡、他的父母和亲戚、他的同学、昔日的恋人、他的老同事、老领导。每个官员和属下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柳成荫的每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人其事。所以,刘仁前没有把柳成荫单纯地作为一个“政治人”来刻画,他也不可能这样。于是,柳成荫不能不与昔日的恋人陆小英重叙旧情,也不能不考虑到父母、熟人的感受,不能不与那么多关系和权力周旋,面对乡亲们的劳动与希望,他在洪水面前甚至丧失了“大局观”,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在故乡短暂的政治生涯。所以,与其说作品在写柳成荫,不如说是通过他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

相较于《香河》的香河村,《浮城》的楚县更为广阔,刘仁前显然是将它作为里下河风土的典型来书写,因此,笔法与前者稍有不同,更硬朗、更概括。如果说前者是以画面和气氛见长的话,后者则以线条和知性取胜。

结论和理由都是明显的,刘仁前等人的意义不仅是地方文学原创力的有力体现,更在于他们的书写是故乡的文学传记。也许人们会质疑现代社会地方性写作的意义,但是,地方依然存在,经验的差异依然存在。同时,地方性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它构成了与“通用写作”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写作类型与写作风格。此外,就中国目前的地域文化与民间经验而言,地方写作显示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文学的地方性写作不是采风,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不是奇异景观的炫耀,而是由当地人书写和创造的当代经验。所以,它在地方文化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优势,在地方文化精神的提升上具有亲和性,它关涉到地方经验的存留。我们的地方正在消失,城镇化使传统的乡村趋于消亡,正因为如此,地方的想象、书写和记忆的打捞就有了文化抢救一样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地方写作的伟大传统。今天,仍然还有许多作家,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更大的文学舞台,专心地为自己的故乡写作。在故乡,他们的作品注定比那些伟大的作品流传得更加久远。

### ■ 短 评

## 秦源根脉的缝补与再现

——读赵文慧《魅力秦源》

□秦 岭

赵文慧煌煌然67万字的《魅力秦源》表现出她靠近大秦帝国源头的姿态,及其对秦地、秦人、秦风、秦事、秦韵的“根的情意”。

大秦帝国位列中国封建王朝之先。但何处是秦源却一度成为学界的困惑。尽管20世纪初王国维等诸多学者通过在甘肃天水南缘出土的秦公簋,认定此地即是秦源;尽管上世纪90年代秦先祖陵在天水南缘的横空出世,再次把世人对大秦先祖的探寻聚焦到了天水。然而,在2900多年黏稠岁月的封堵与冲刷中,秦源的学术判定始终扑朔迷离。作为秦人的后裔,赵文慧显然憋不住了,他把目光再次锁定在生他养他的故土上。《魅力秦源》分为“风俗民情”、“方言俗语”、“山歌民谣”、“楹联文赋”、“名胜遗珍”、“传统技艺”、“古今英才”和“细说漫忆”8辑,每一辑都遵循了作者独有的耕作方式:直播、套种、换茬。现代意识和民间意味的种子,长出的是与岁月有关的秦源文物、古树、碑文、先贤、名流、泥塑、社火、神话、传说、节日、交际、生活、婚嫁、丧葬、民事、屋居、择居、尚武、风水、庙会、信仰、美食、方言、词汇、农谚、俗语等几十个种类的

秦源遗风、遗存、遗韵。该书通篇以天水西南部西汉水流域为表现载体,以天水市秦州区西南部的秦岭、杨家寺、牡丹、平南、小天水以及原天水行署所辖的礼县东北部、西和县北部的红河、岔官、祁山、长道诸乡镇为观察原点,穿针引线,查缺补漏,再现了一方富有史料性、档案性、志书性、民俗性的秦源胜景。

赵文慧在时代烟火中不拘一格、雅俗共赏的梳理,特别是对一方水土的注解和演绎,或切入秦源内心,或在秦源的边角游走,似让人感受到了先祖伏羲、女娲的史前遗风,殷周时秦人从跋涉到崛起的奋争步履,秦始皇先祖秦襄公夫妇、秦西陲陵园庄严的沉静,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萧萧班马鸣……

《魅力秦源》写作的难度在于:面对捉襟见肘的史料铁门框,若从小处着手,必然无法做大;若从大处着眼,必然无从做效。客居山东的赵文慧既不是专家,也不是所谓的“圈内”人,他用警觉与清醒、萌动与冲动、自觉与自信、愤懑与悲情,使思想和情绪流淌于故土的沧桑与宁静。他像偏向虎山行的独行侠,穿越纵横阡陌,又力求疏而

**本报讯** 作为一本综合性的诗歌刊物,《诗刊》一直以来对传统诗词都特别重视。随着写作传统诗词的诗人增多,诗刊社成立了子曰诗社,为海内外广大的诗词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发表作品的平台。

据《诗刊》副主编商震介绍,子曰诗社欢迎各地的诗词爱好者加入,既可以个人名义,也可以社团集体名义加入。申请加入诗社须提交2至5首诗词作品,并填写登记表。登记表可到“诗词吾爱”(www.shici52.com)网下载,按要求填好后,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发到诗刊社投稿信箱,并以纸质文本的形式寄到诗刊社,以登记备案。另外,作为子曰诗社的一项重要活动,诗刊社今年拟出版4期《诗刊增刊·当代诗词专号》,编发当代诗词名家和子曰诗社员作品,还开辟诗词论坛、书画等栏目,探讨诗词书画艺术的发展。(欣 闻)

### ■ 关 注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中国,在大凉山的森林中,流传着诺苏(即彝族)人民的神话,矗立着吉勒布特(四川大凉山一地名,是诗人的故乡)之树。诺苏的先人们是白雪部落的12个儿子,至今依然头戴面具、身穿金衣,排列在亘古不变的阳光下。他的父亲是英雄支阿鲁(彝族创世史诗传说中英雄)。他的母亲从不衰老。他美丽、温柔的呷玛阿妞(彝族史诗传说中的美女)永远不死。吉狄马加是千年的传人,神鹰在他的头顶盘旋。他的祖先蹒跚地靠近并喃喃地呼他的名字:吉姆、吉日、阿伙、瓦史、各各、木体、牛牛。他属于诺苏或称彝人。

他写诗,因为在他的故乡,一个人会变成一只白虎。他的诗篇是会说话的植物,是种植在祖先的花园里的记忆之花,是为了不让更多物种死去。

最初人类的肌肉是紫色山峦的泥土,荞麦生长在山体上,一轮金色的太阳滋养着它。诗人在古老的大地上书写日记。他的道路在询问英雄们的足迹,后者的业绩超越一切时代。诗人生动的想象找到了他们。

诗人用火的话语唤醒所有的人。通过词语隐藏的力量,人类能转化自己在现实黑暗中死去的世界。对雨露滋润的白色土地的向往生活在万物中。虚无地喃喃自语并书写生命名字,赋予它不朽的植物。古人又置身于歌舞和神圣仪式的壮丽中,栖息在纯洁的草原上。过去的根依然盘踞在身边!

万个诞生与死亡在诗人神奇的语言中复活。多少精灵在黑色的土地和天空中徜徉,使世界沉浸在陌生时间的水中,倾听从另一个世界迸发出来的歌声。这是他的领地,繁荣于我们的记忆之前。宛如一行骑手映入我们的视野,老者和智者一同归来,重又体现出世界的真理。

巨人们手持太虚之盾,站立在蜿蜒于山中的河谷,守护着广阔的大门,门上印着“根源之书”的金字。这英雄推开传奇之门并阅读。他的肩膀托着温柔的蜻蜓,大地上的爱幸存于她闪光的翅膀。“花的号角”向着星河歌唱自己的爱情。“我们未来的文明已经生活在一棵金色的树下”,它的基础是神话与传说,它最终指向了和平与地球上诗歌正义的庆典。

诗人间世世代代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书写了地球精神的历史,体验着人民和英雄们无往不胜的爱情。他们的梦想在战斗中被诗的行为点燃,面对死神,精力充沛的生命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新的光明之门,为了使古老的地球和未来的地球融为一体。

这是我阅读吉狄马加伟大、美丽而又深刻的诗句后产生的想法。我认同他的观念和诗歌体验。阅读他的诗作令人感到清新并使我产生了许多快乐。但愿这不低于诗人的预期。

不漏。他把前7辑集中打包,对秦源大地一寸一寸立体扫描,然后让第8辑来个“细说漫忆”的回马枪,让各路秦史、民俗专家的评说作为映衬、验证、补充、呼应,显示了作品的可读与可信。在宏观把握与经纬观照上,他用麦田间苗、果园剪枝之法,立足秦源,散点透视。

《魅力秦源》布局上图文并茂,论证上引经据典,主题上强力辐射,史料上八方采撷,背景上联袂内外,仿佛搓就秦源的一盘草绳,沟通古今,在2900年后打了一个沉重又美丽的结。这样的文化缝补,既异于专家,也异于官员;既异于记者,也异于作家。赵文慧更像一位眼不花耳不聋的农家老婆子,盘腿打坐在秦源的崖畔上,在千年的日头之下,对着历史“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魅力秦源》显然无意在研史、说理、论述层面讲求学术之架构,说理之格局,论述之定法。它是民间的迷踪拳,不求套路,但求无形中的有形。这种并不多见的人文精神和追求,已经闪耀着玉的光泽与温润。至于材料取舍、技术层面的明显欠缺,亦是与“砖”无关紧要了。

此外,《魅力秦源》还告诉我另外一种可能:在朝代更替的遗存湮灭、历史断代的解读失忆以及传统传记的空白之外,只要选准观察视角,历史照样可以在时空的罅隙里峰回路转,别有洞天。

## 国家大剧院举办“歌剧爱好者沙龙”

**本报讯** 日前,随着“郭淑珍和她的学生们”活动的举行,国家大剧院歌剧节普及活动之“歌剧爱好者沙龙”正式拉开帷幕。

86岁高龄的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曾以一曲《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怨”影响了几代观众。作为声乐教育家,她为我国声乐歌剧教育事业奉献了60余年,学生包括张立萍、么红、吴碧霞等如今歌剧界的顶梁柱。当天活动开场,郭淑珍首先结合自身经历,和观众分享对歌剧艺术的感悟,畅谈了歌剧演出的艺术魅力。随后,她邀请意大利籍声乐指导、现任职于德国北豪森歌剧院合唱指导的Elena Pierini,以及谢天、王秀芬、孙媛媛、李国玲等多位得意门生,演绎了威尔第歌剧《阿依达》经典咏叹调片段,还现场为两位歌剧爱好者进行了声乐演唱片段的指导,拉近了观众与歌剧之间的距离。

据悉,“歌剧爱好者沙龙”接下来还有4场,参与的艺术家的包括蜚声海内外歌剧舞台的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屡获国际声乐比赛大奖的“80后”青年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张佳林等。

(徐 健)

##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出版

**本报讯** 由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编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延续以往传统的基础上,该书收录了2012年度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较有特色的学术论文及评论,从不侧面反映了年度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与进展。无论是理论热点问题的探讨,如张炯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南帆的《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陈晓明的《去历史化的大叙事》,还是作家作品的评析,如张莉的《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均体现了学者们的严谨、敏锐与热忱,展现了扎实灵动的文风、紧密结合创作实践的理论自觉,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

(欣 闻)